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典型形态论

黎跃进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摘要: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最为成熟和典型的阶段。东方各民族文学都产生了一批在文学史上占据显著地位的民族主义诗人、作家和理论家,他们的创作和理论活动,充分展现了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共同原则和特征:反对殖民统治,高扬民族意识,要求民族独立的主题思想;功利性、现实性的审美追求;民族传统的弘扬与民族灵魂的呼唤。

关键词:东方;民族主义;民族意识;审美追求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1-0121-06

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最为成熟和典型的阶段。两次世界大战和殖民体系瓦解,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东方各具特色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形成。这期间东方各民族在完成传统文学向新的民族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达到了自觉性、普遍性、实践性和统一性的程度,各国文学都产生了一批在文学史上占据显著地位的民族主义作家、诗人和理论家,他们的创作和理论活动,充分展现了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共同原则和特征,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典型形态。

一、反对殖民统治,高扬民族意识,要求民族独立的主题思想

西方的殖民统治给东方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这成为东方民族要求政治独立、自由平等的逻辑起点。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全面展示了殖民统治带给东方的动荡、战乱、屈辱和贫困。东方现代民族主义作家对殖民统治者带给民族的种种灾难和痛苦有生动具体的表现。

印度尼西亚诗人鲁斯丹·埃芬迪在题为《祖国》的诗中写道:“啊,我的祖国,苦难无比/哀叹和呼喊命运的悲凄/低头弯腰双手擎着耻辱/任人践踏让苦难折磨自己/汗水洒满地,鲜血流成河/啊,我的祖国,苦难无比。”^{[1]447}

印度英语作家安纳德1937年的小说《两叶一芽》以阿萨密一个茶叶种植园为英国殖民统治的缩影,以契约劳工甘鼓一家的遭遇表现印度农民的悲惨命运。小说真实生动地描述了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民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甘鼓,这个勤劳淳朴、笃信宗教、忍辱负重、宽以待人的印度农民,就是象征意义上的殖民统治下的印度。

喀麦隆的著名作家费丁南·奥约诺(1929-)的作品,描写了黑人遭受的专横残暴统治。长篇小说《童仆的一生》(1956),用自传体和日记的形式,叙述主人公敦吉的经历和体验,从一个黑人奴仆的视角,撩开殖民者文明、道德、善良的面纱,表现非洲人民的苦难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伊克巴尔的长诗《痛苦的画卷》(1904)以悲愤的笔致,真实地展示了他耳闻

收稿日期:2008-06-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02BWW005)

作者简介:黎跃进(1957-)男,湖南资兴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全国东方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印度文学学会理事,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东方文学、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网 <http://qks.cqu.edu.cn>

目睹殖民主义对印度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描绘了当时社会满目疮痍,农村凋敝、手工业破产,灾荒不断的悲惨境地。

从整体看,东方现代作家对殖民统治罪恶的揭露,主要不是在生活事像的描写上,更多的是从政治独立和精神自由方面加以表达。

阿尔达夫·侯赛因·哈利有一首《英国人的自由和印度的被奴役》:“据说只要呼吸一下英国的空气,奴隶们就可以获得自由,这就是英国的奇迹。/只要一踏上英国的国土,奴隶们的脚镣就会自动断裂脱离。/如果说英国是个奇妙的炼金术士,那印度也毫不逊色不比它低。/自由的人到了这里马上变得不自由,一接触这里的空气,就会立刻变成奴隶。”^{[2]171}诗作将英国与印度鲜明对比,揭示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的奴役。

印尼作家马尔戈的《放牛娃》以象征手法,从放牛娃的视角表达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决心,放牛娃祖辈相传的牧地被一“女神”率领的一群猛兽占领,放牛娃准备夺回牧地,“女神”施以小恩小惠从中阻挠,放牛娃清楚殖民主义的本质:“你的承诺全是谎言/把我们的全体民族/推进了苦难的深渊/你们却有无尽财源。”^{[1]412}

在现代东方诗人看来,殖民统治真正的危害,还不是殖民地人们生活的贫困和战争的创伤之类,而是对殖民地人们的精神奴役,它使其丧失斗志和反抗的能力,成为“笼中鸟”郁闷而死。

印度乌尔都语诗人杰格伯斯德写道:“周围弥漫着一片不满的气氛,只听到整个花园如诉如泣。/窝里的鸟儿如今被关在笼中,独立变成了一股香气消失在花园里。/在这样的环境中花儿怎能开放?/花儿笑不出声,充满了忧郁。”^{[2]196}对殖民统治精神奴役的表现,都是对外来者侵略本性的揭露,都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看取西方列强的未来,以“同仇敌忾”的书写,唤起同胞的民族意识。

怎样才能获得民族的独立?东方现代民族主义诗人和作家在文学世界中进行民族解放道路的种种探讨,在他们看来,团结奋斗、保持尊严、不怕牺牲、坚定胜利的信心是民族独立的基本保障。

(一) 团结奋斗

“‘民族’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相同”^{[3]48}。从早期的血缘宗族,到基于血缘的部落联盟,再到一定地理单元的利益共同体,发展到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社会群体,“民族”的范围、规模不断扩大。东方民族的构成非常复杂。由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宗教信仰所构成的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彼此联系,又彼此冲突。面对西方殖民统治,这些矛盾和冲突是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内部矛盾和冲突。东方现代民族主义作家和诗人敏锐地意识到:大敌当前,只有放弃内部冲突,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才能赶走侵略者;只有建立起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才能寻求建设和发展。才有与西方

平等对话的资本。

伊克巴尔早期的爱国主义诗作认为印度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国家统一和振兴的重要条件。他早期的诗作深刻地表达了在殖民统治下人民的心声,充满了印度穆斯林传统的印度情感和自豪感以及对伊斯兰过去历史功绩的颂扬。《喜马拉雅山》这首祖国颂诗,便体现了诗人的这种情感。他主张建立统一的印度民族国家,把“印度斯坦”当作印度人的祖国,这在他的长诗《印度之歌》中得到体现。埃及诗人邵基在1927年的一首诗中号召整个阿拉伯世界联合团结:“真主使我们同病相怜,同样的遭遇,同样的悲惨。/每当伊拉克受伤发出呻吟,东边的阿曼也同样会有痛感。/我们与你们都身戴锁链,如同雄狮挣扎在铁笼间。/我们在这样的世界上同样贫困,又同样地热爱自己的家园……”^{[4]122}

1962年亚非作家会议召开,大会形成的《总决议》中有这样的表述:“人民的觉醒和警惕加强了我们的团结——两大洲的人民正在重新团结起来。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这个本质的变化,民族解放运动的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各方面的扩大和巩固,这一切都是力量对比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5]56}

(二) 保持尊严

尊严,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民族之为民族的根本。面对外辱,只有民族成员都以民族尊严为首务,为民族尊严而奋斗,才有独立解放的希望。相反,如果民族成员都甘心屈辱,苟且偷安,何来独立与解放?

印度乌尔都语诗人穆罕默德·侯赛因·阿扎德深感在印度现实中,当国家面临生死攸关的严峻时刻却缺少为民族尊严而奋斗的英雄,于是,在他195行的长诗《爱国者》中,他满怀激情地颂扬了印度历史上为祖国尊严而牺牲的英雄:“喂,爱国的太阳,你在哪里?/为什么如今见不到你?/没有你,祖国家家家户户一片漆黑,没有你的光辉,我们心中的积郁重新泛起。”^{[2]178}摩洛哥诗人阿卜杜拉·卡嫩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异乡人不是远离故土,而在自己的祖国却受虐待。/异乡人会有消愁解闷时,我这样的人却无法忘掉悲哀。/我忧心忡忡,却得不到帮助,于是终身都是忧伤满怀。/我为这个国家哭泣,这里愚昧横行,一伙笨蛋驱赶着人民,任意胡来……”^{[4]431}印度尼西亚诗人马尔戈在《独立自由》中就是将“人格尊严”与独立自由相提并论:“我等追求的独立自由/是我民族的人格尊严/让我的民族也能拥有/与其他民族同样体面”^{[1]410}。

为了民族尊严,即使面对敌人的屠刀与监禁,也能从容镇定,慷慨高歌。也门诗人、民族主义政治家祖白里有一首《出狱》:“我们昂首挺胸走出牢门,如同一群雄狮冲出莽林。/我们在枪间刀锋上走过,穿过鬼门关,面对过死神。/我们不愿苟且偷生,受人蹂躏,暴君的威吓、压迫岂能容忍?!/天塌地陷,我们不怕,千难万险难不住我们。/我们要让我们的民族知道,我们愿赴汤蹈火为他献身。/我

们若是取得了顺利，/说明困难吓不倒勇敢的人；/我们若是牺牲了，/则会面不改色，笑傲死神……”^{[4]549}

(三) 不怕牺牲

民族解放是血与火的洗礼，难免牺牲。但这是以小我的牺牲换取整个民族的新生，是虽死犹生的大业。

焦希·莫利哈巴迪被称为“争取印巴次大陆解放的旗手”。他在诗集《火焰与露珠》中有一首诗：“欢笑吧！亚洲，金光闪闪的大地，/印度觉醒的时刻已经来到。/欢乐吧！印度，这人间的乐园，/流血在眼前，敌人剑出鞘。/铁石心肠的疯子准备血染你的旗帜，/印度教徒穆斯林要保卫你的每一寸土地。/祖国人民的希望之花含苞欲放，/两大民族的鲜血将合流于祖国大地。”^{[2]219}诗作洋溢着为祖国不惜流血牺牲的豪情。

缅甸作家貌廷的长篇小说《鄂巴》(1946)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中刻画了爱国民族英雄德钦谬纽，面对敌人的屠杀，满怀“为祖国而献身”的气概，视死如归，昂首挺胸，在响彻山谷的“缅甸万岁”的呼喊中英勇就义^{[6]564}。

马格里布地区复兴运动先驱、突尼斯民族主义诗人塔希尔·哈达德(1899-1935年)一首题为《祖国》的诗作，始终写道：“祖国，我为你愿将生命、财产献上，/使我们一起摆脱凌辱，获得解放。/我愿为你牺牲，我的祖国，我的故乡，/你是我的骄傲，你是我的希望。”^{[4]459}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诗人和作家之所以能为民族、为祖国不怕流血牺牲，是因为他们满怀祖国自由独立的理想和信念。在祖国自由独立的理想和信念中展开想象的翅膀，描绘未来前景，激励人民斗志。乌尔都语诗人恰克伯斯特(1882-1926年)的诗集《祖国的黎明》呼唤祖国独立自由，抒发为祖国捐躯的激情。奥利萨语的高伯本图·达斯(1877-1928年)在狱中写了《狱中诗抄》、《囚徒的独白》和《印度母亲》等诗集，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情绪、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情怀和为国献身的激情。巴拉蒂有《向祖国致敬》、《祖国》、《我的母亲》、《婆罗多国之歌》、《自由的渴望》和《歌唱自由之伟大》等。在《向祖国致敬》中，巴拉蒂把祖国比作母亲，他说：“不管我们是胜利、失败或者死亡，/我们始终团结一致，/发出一个声音：/向母亲致敬！”^{[7]830}

(四) 坚定胜利的信心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作家、诗人以极大的热情憧憬民族独立的未来，描绘一个崭新的民族自我。被称为“阿尔及利亚诗王”的穆罕默德·伊德以极大的热情抒写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在题为《解放军之歌》的诗中写道：“我们解放大军是战斗的力量，/南征北战，好像猛虎雄狮一样。/战鼓咚咚，军号吹响，/我们分歧，使祖国大地震荡。/我们将高山当作堡垒，/我们的赞歌在山中回响。/广播把我们胜利的消息告诉人们，/捷报频传。喜讯飞向四方。/我们勇敢，我们顽强，我们曾树立起多少光

辉的榜样。/我们像熊熊烈火奔赴战场，/千难万险都不放在心上。/我们转动战磨，取得胜利，/严惩敌人，让他们把苦头尝。/我们要把殖民主义彻底埋葬，/让我们的人民挣脱枷锁，求得解放。”^{[4]410-411}诗作洋溢着必胜的豪情。苏丹诗人法图里有一首《非洲之歌》：“啊，我在东方各地的兄弟，/啊，我在世界各地的兄弟，/是你在呼唤你，你可认识我？/啊，我的兄弟，我的患难知己！/我已经扯破了黑暗的尸衣，/我已经摧毁了软弱的墙壁；/我不再是讲述腐朽的墓地，/我不再是哭泣垃圾的小溪；/我不再是自己锁链的奴隶，/我不再崇拜偶像和衰老的过去；/不怕死亡，我将永远长存，/不受时间所限，我将永远是自由之躯……”^{[4]233}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从各个层面表达了反帝反殖民、追求民族独立的主题。

二、功用性、现实性的审美追求

文学思潮是特定时代精神在文学领域的群体性反映。但一个时代的作家、文学理论家对时代精神是否具有自觉的意识，是文学思潮是否形成的一个标志。在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的20世纪前60年，东方民族主义作家自觉地追求文学的功用性和现实性，具有明确的目的意识，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主张真实地表现现实中普通人民的情感和生活。

(一) 服务于民族独立的文学目的论

在民族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展开的岁月里，不少作家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运动，文学成为他们手中的武器，因而他们的创作倾向明显。缅甸作家、文学批评家吴登佩敏在《吴龙传》的序言中说：“当沦为奴隶的缅甸人民产生民族意识，要求独立的时候，当贫苦的农民要求生存权利的时候，一个不倾向于任何一方的人，会全力以赴支持沦为奴隶的缅甸人民吗？会积极支持贫苦农民吗？”作为一个“进步作家”，就应该为“民族的独立，贫苦人的幸福”而写作^{[8]256}。埃及作家阿卜杜·拉赫曼·哈密西(1920-1987年)在一篇《文学为人民》的文章中写道：“人民所要读的作家是逃脱出隐居禅房，探求人生经历的人；是描绘民族斗争维护人民及其自由的人；是随时准备为大家的生存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而损害公众利益的人。人民要读的文学是与人们密切相关的。它启迪人们为幸福的未来而斗争，它反对人剥削人，它知道憎恶那些压迫者，并能煽动起被压迫者的仇恨。人民要读的文学是时代的画卷，是反对暴虐斗争的镜子，并激励人们反对帝国主义与剥削制度的斗志。”^{[4]164-165}反帝反殖，维护民族和人民的独立自由是民族主义文学追求的目标。

印度现代文坛巨擘普列姆昌德也主张目的明确的文学论。1930年他在《大印度》刊载文章表明：“我的意愿是非常有限的，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在独立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不追求金钱，因为不追求名誉，有吃的就行，我不渴望小轿车和别墅。无

疑,我一定想留下几部第一流的作品,但是其目的还是为了独立。”^{[9]282}普列姆昌德的意识很明确,希望创作几部传世之作,但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独立”。当然,这种独立的含义是多方面的,苏丹诗人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迈哈朱布曾说:“这是我们的理想:维护我们的伊斯兰教,掌握我们阿拉伯的遗产,同时对广阔的思想天地采取完全宽容的态度,要有宏图大志去研究、学习别人的文化。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民族文学的复兴,激发我们的爱国意识,直至形成一个政治运动,实现我们政治、社会、思想的独立。”^{[4]228}

正是将文学当作反帝反殖的武器,民族主义作家要求创作出催人奋发、昂扬向上、坚强有力的文学,而不是伤感绝望、软弱无力、哀愁呻吟的文学。旅美派作家、文学批评家哈雷尼斯倡导“行动文学”和“强力文学”,反对“哭泣的文学”和“软弱的文学”。他说:“我们,说真的,是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最爱哭泣和嚎啕的民族,我们好像是用泪水和悲哀造成的,好像是痛苦的气息吹成的……这是一种比我们身上的任何病都普遍的疾病,对我们民族的完全幸福具有最大的危险。它是最丑恶的流行病,因为他对思想和心灵起着黑暗统治和专职法律所起不了的作用。”^{[7]1300}他甚至认为,“哭泣文学”是殖民主义的一个方面军,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他号召把祖国、民族从哭泣文学中拯救出来,把哭泣文学变换为民族主义需要的“强力文学”。印度的乌尔都语文学批评家阿扎德也认为:诗人可以改变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他尤其谈到战争题材的诗作,如战斗中的鼓动诗和战斗歌曲,它们使战士心中产生一种新的激情和热情,从而增强他们的决心和勇气,并由此改变战场的形势。^{[2]363}如此对文学功用的强调,也许有些夸张或偏颇,但却体现了东方现代民族主义作家的文学观念。

(二)文学必须表达时代的脉搏和民众的现实愿望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是在民族解放的时代要求中动员民众、鼓动民众的文学,它以普通民众为读者对象。埃及现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萨拉迈·穆萨(1888-1958年)于1914年创办《未来》杂志,参与十多种报刊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参加文学论争,分别在1926年、1927年、1930年写下了《萨拉迈·穆萨文选》、《今天与明天》、《论生活与文学》等文论著作。在论著中就埃及文学的现代转型提出了许多见解和看法,他强调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认为阿拉伯古代文学多为“国王的文学”和“消遣的文学”,现代文学则应是千百万人的文学、人民的文学、斗争的文学。应该建立反对殖民主义压迫、用人民语言书写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他指出:“人民是一切,人民是始与终。”文学家对此是负有责任的,在他们所写的一切作品中都应体现这一责任。他提出埃及文学应建立在“意义和目标”之上,而不是像阿拉伯人过去那样,建立在“词藻”之上。^{[7]1325}他还认

为:“文学的目标是人道主义,而不是艺术美。人道主义比美更具有永恒性。文学是从整体上,而不是从局部去观照人类的艺术。”^{[10]414-415}他的一些观点和主张,在20世纪上半叶,曾引起埃及乃至阿拉伯思想文化界的激烈争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叙利亚诗人舍菲格·杰卜里说:“诗人必须同大众的情感一致,这种情感就是民族主义感情。”他还说:“无疑,我专门写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诗篇,使我未能涉足其他的天地。但我是适应环境,服从最大的题旨的。我觉得我必须照顾全国的感情。如果说诗人是民族的代言人,那我就是试图用一切机会表达这个民族的感情。”^{[4]342}巴勒斯坦诗人迈哈穆德·德尔维什强调诗作于人民的关系:“如果我们的诗歌,不能像明灯高涨照,不能传遍千家万户,让人人知晓,那它就不是诗,只是无声无息/既没有颜色,也没有味道。//如果我们的诗歌/普通百姓根本不懂,那就应当把它撕碎/让风吹得干干净净,然后闭紧嘴巴,别再作声!”^{[4]389}

在民族运动高涨的时期,印度的民族主义作家都强调创作与时代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泰戈尔号召作家“不要与周围世界隔绝”。乌尔都语作家伊克巴尔认为“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必须反映生活”,号召作家“熟悉民族的脉搏”。孟加拉语作家伊斯拉姆认为,文学应成为“打动亿万人民之心的人民文学”,文学应为祖国独立事业服务,发出“世上受压迫灵魂的痛苦呐喊”。泰米尔语作家巴拉蒂(1882-1921年)主张,文学应给“被压迫人民以新生活的信息”。在文学是工具、是呐喊、是号角的艺术主张之下,许多文学家自觉地以文学服务于当时的民族解放斗争,掀起了空前未有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7]819}

(三)投身现实,反对“为艺术而艺术”

参加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的一位喀麦隆代表说:“今天,殖民制度在人民武装的痛击下,正在倾塌之中,帝国主义的恶魔正在血泊里挣扎颤抖,哪一个亚非作家能够接受‘为艺术而艺术’或是‘文学应该和政治分家’的理论?尤其是在今天,任何一个接受‘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事实上就是出卖自己的才能,做了杀害我们的人民和文化的同谋罪犯!”^[11]现在看来,这样的表述有些太浓的火药味,但确实真实地说出了当时东方民族主义作家的心声。

不仅民族解放的现实要求作家、诗人关注现实,积极投身民族运动的实际斗争,有些文学批评家还结合文学史上的事例来论证文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乌尔都语文学评论家毛拉那·希伯利·努玛尼在《波斯诗歌》中认为:“写出来的诗歌如果只是为了欣赏,那么可以运用夸张的手段。但是作为一种可以对民族的命运产生影响的有力量的诗,可以使国家发生巨变。可以唤起阿拉伯民族觉醒的诗,如果不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现实的话,那它将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的蒙昧时期,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写了一首诗,就可以在整个阿拉伯

世界扬名。与此相反,伊朗的许多诗人写了无数颂扬帝王将相的颂诗,他们仍然名不见经传,原因在于伊斯兰教产生以前的蒙昧时期,诗歌是真实的,所以它具有影响力,伊朗诗人只追求文字的华丽,这种诗只能有一丝的娱乐效果。至于其他,那就根本不值得一谈。”^{[2]370}换句话说,只有真实地表现现实,诗人的情感与民众的情感有着内在的一致,诗作才能拥有生命力。远离现实的歌功颂德之作,即使有艳丽华美的文字,也价值不大。而唤起民族觉醒、促进国家变革的民族主义文学,必须是真实的、现实的创作,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字游戏。

曾任突尼斯作家协会主席的当代批评家穆罕默德·姆扎利(1925-)在1969年发表的文论著作《思想启示录》中,集中表达了他对文化和文学的见解。其主要观点是:“建立真正的民族文化和突尼斯文学,此文学应从民族自身深处产生。文学是影响和被影响,是给与取,是和时代、环境、现实的对话、交流和辩论。文学具有崇高使命,关心人类事务,不应怕政治参与,但应区分文学与政治,反对奴隶主义和空洞虚伪……对文学的总的要求:体验的真确,观点的新颖,表达的地道,目的的真诚。”^{[10]348}

在东方现代民族主义作家中,有些作家并不简单地否定文学的艺术性。印度的泰戈尔、埃及的陶菲格·哈基姆都是例子。陶菲格·哈基姆是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现代文坛最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他从思想家的立场探讨了文艺的美学本质问题。在《文学艺术》的开篇他就指出:“只有文学才会发现和保存人类和民族永恒的价值,只有文学才会带有并传承民族性和人性觉悟的钥匙……而艺术则是驮着文学在时间与空间驰骋的活跃而有力的骏马。”^[12]他甚至提出了“象牙之塔”论。在《来自象牙之塔》一书中说:“我不要求作家把自己囚禁起来,与世无交,以成为一个思想家,或离群索居,生活在思考的禅房里,而是要求他们与那些他欲与之交流的各色人等进行交往……作家经常生活在人们中间,但他又置身于高耸的‘象牙之塔’中,这象牙之塔不是别的什么,只是那颗超越践踏的纯洁的心。他和人们在一起,在泥土中,是以他的身体,而不是他的心。他和他们分享一切,但不分享他们的道德虚弱、思想贫乏。他和人们在一起,为的是了解他们,爱护他们,描摹他们,之后却要引导他们,以使他们有一个榜样。”^{[10]603}陶菲格·哈基姆从作家的角度,指出文学与生活的本质关系问题。这里的“象牙之塔”,实际是指文学源于生活,又指导生活;文学源于现实,又引导现实的辩证关系。

三、民族传统的弘扬与民族灵魂的呼唤

民族主义文学在东方现代民族运动中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以情动人,唤起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意识。民族认同意识必须以经验世界为依托,以民族语言和文化为认同媒介。若没有认同媒介,民族认同意识无从表达,无以寄存。因而,民族的历史、传说、神话,真实的或臆想的民族始祖以及各种

民族习俗,祖国的名山大川,都可作为民族认同媒介而发挥重要作用。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作家,以各种方式从已有的民族资源中发掘文学意象,弘扬民族传统,呼唤民族灵魂。

埃及诗人邵基290联的著名长诗《尼罗河谷的巨大事件》,描绘埃及的巨幅历史画卷和祖先的光荣业绩,追溯伟大的法老时代和古老埃及的历史文化,为民族久远辉煌的历史传统而自豪。马哈福兹早期创作历史小说的热情很高,花大力气研究民族历史,意在从民族文化中发掘显示民族解放需要的能量。他曾计划写40部历史小说,都拟定了创作的题目。虽然后来没有按计划写作,但他谈到目的已经达到:“通过历史,我已经说出了我要说的主题:废黜国王,梦想一场人民革命,实现独立。”^{[4]213}埃及最典型的呼唤民族灵魂的作品是哈基姆·陶菲格的长篇小说《灵魂归来》。

印度不仅有雄伟的山脉、浩瀚的海洋和奔腾的江河,更有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人文遗产。印度的民族主义诗人、作家当然引以自豪。伊克巴尔在他的著名诗作《印度人之歌》中将古老的印度文明与其他文明比较:“希腊、埃及、罗马都已从大地上消逝,但我们的名字和标志依然留存至今。/我们的标识不灭自有其原因,/尽管时代变迁,我们多少次抵御过入侵的敌人。”谢利特·巴特格的代表诗作是歌颂印度的光荣历史《印度之歌》。迈提里谢嵩·古伯德的《印度之声》2500行,其中的《往事篇》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印度古代文明和文化,她讴歌古代的高亢调子很能激励起青年人的热情”^{[13]251}。古伯德在《自思》中把祖国说成是“升起太阳的地方”,她可以发出“哈奴曼一样的力量”。瓦拉托尔在《母亲的颂歌》中说:“母亲的语言是具体的吠陀,为她服务是我们神圣的职责,我们的生命为母亲奉献,兄弟们,比母亲伟大的神还有哪个?”^{[7]831}诗中对吠陀的推崇、对祖国母亲的评价是很虔诚的。伊斯拉姆是位穆斯林诗人,但他深受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叛逆者》这首著名长诗中,说自己“是因陀罗的儿子”,“是‘青颈’,“吞下了从苦海里搅出的毒药”^{[7]831}。

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诗人耶明非常重视民族语言的民族认同功能,它第一个运用“高级马来语”写诗,在1921年写作了诗作《语言与民族》:“生于自己的民族,是用自己的语言/左邻右舍都是一家的成员/马来土地把我们抚养成高尚的人/在欢乐的时刻,还是在悲痛之中/手足之情把我们紧密相连/从语言中听到了情谊绵绵/……从孩提时代和青年时期/直到死后埋入黄土里/自己的语言从不忘记/青年们要牢记,苦难的苏门答腊啊/没有了语言,民族也就绝迹。”^{[1]438-439}

民族认同有不同方式,古老民族以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传统和习俗认同。这里就伊朗作家赫达亚特的长篇游记《伊斯法罕半天下》稍作展开。游记描述作者在一次假期中四天远游伊斯法罕的见闻和感受。文中详细叙述他启程赴伊斯法罕途中的经

历,在伊斯法罕游览恰哈尔巴格林荫道、肖塞却什米大桥、契赫尔苏通宫殿、梅达尼沙赫广场、阿里·卡波宫、甲米清真寺、伊玛姆·扎杰·伊斯曼尔陵墓、摆晃塔、祆教徒之山等15处名胜的情景,交织穿插历史传说、现实场景和自然风光的描绘,叙述、描写、抒情熔于一炉,展示了伊斯法罕这座文化名城的历史厚重与沧桑,作品渗透着作者的民族自豪感。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伊斯法罕的清真寺、大桥、园屋顶、高塔、瓷砖、卡拉姆卡尔布,直到今日还没有失去他们的雄姿和光彩。这座工艺大师辈出的城市,在赛菲维特王朝时期,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如今依然享有历史上的盛名。”^[14]作家是在对民族艺术传统的赞美中,鞭挞和批判现实社会,追寻民族文化之根。

民族独有的特征,往往成为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象征。在民族主义诗人、作家笔下,这些特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内涵而受到赞美与呼唤。桑戈尔的《黑色的妇女》很有代表性,其中:“裸着身子的妇女,皮肤黝黑的妇女! /像熟透的饱满的果实,像醉人的黑色的美酒, /你的双唇呀,使我的双唇神往; /透明的远方草原呀, /在东风热烈的抚爱下微微颤动。 /雕刻精美的板鼓,绷得紧紧地板鼓, /战士的手指敲得你达达响。 /你的声音深邃而低沉—— /你是崇高的爱情的歌声。”^[15]这里的“黑女人”,不是性别意义上的黑肤色的女人,而是诗人心灵中的非洲、非洲精神、非洲灵魂。

在20世纪前六十余年里,东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而逐渐成熟,达到高潮。东方各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形成了各自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东方主要国家的文学都完成了民族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蕴含各自民族文化精神的民族主义文学成为主流思潮,它以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生活作肥沃土壤,表达了东方人民的

思想、情感和审美追求。

参考文献:

- [1]梁立基.印度尼西亚文学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
- [2]阿布赖斯·西迪基.乌尔都语文学史[M].山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 [3]黎跃进.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 [4]仲跻昆.阿拉伯现代文学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 [5]亚非作家会议中国联络委员会.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文件汇编[C].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56.
- [6]季羨林.东方文学作品选(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564.
- [7]高慧勤,栾文华.东方现代文学史[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
- [8]刘安武.印度现代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282.
- [9]姚秉彦,李谋,蔡祝生.缅甸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10]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世界诗学大词典[K].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
- [11]冰心.亚非作家的战斗友谊[N].文汇报.1962-04-08.
- [12]季羨林.东方文学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1481.
- [13]刘安武.印度印地语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251.
- [14]赫达亚特.赫达亚特小说选[M].潘庆龄,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15]伊·德·尼基福罗娃.非洲现代文学史(上)[M].刘宗次,赵陵生,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259.

On the Typical Form of Oriental Literature of Modern Nationalism

LI Yue-jin

(School of Litera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 the 1960s, modern nationalism is the Oriental litera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st typical mature stage. Oriental literature of all ethnic groups has produced a number of nationalist poets, writers and theoreticians who occupy a prominent place in literary history, and whose composition and theory fully demonstrated the common princip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ast modern nationalist literature: (1) against colonial rule, holding high national consciousness, national independence requirements; (2) utility and reality of the aesthetic pursuit; (3) the call of national traditions and national soul.

Key words: Oriental; nationalism;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esthetic pursuit

(责任编辑 胡志平)